

“抗日神剧”为何难以被接受

韩元

直到今天,半实半虚的历史演义小说还在被作为经典印刷出版,并被改编成各种影视作品,很少听到批评的声音。而抗日剧因为神化倾向却引起了众怒,个中原因或许是,宫廷剧可以戏说,民族惨痛的历史不容戏说。抗日的历史作为一个离现在不远的过去式,是我们民族近现代的切肤之痛,所以,如果出现演义体的美学风格,是不能被还幸存的历史当事人和严肃的批评家所接受的。

上世纪 30 年代爆发的抗日战争加剧了民族危机,割裂了传统社会稳定的家国一体,对现代化转型中的农业中国的经济、政治和伦理价值观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从而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认同感,各种民族主义思潮也在此时兴起活跃。文艺作品中以团结抗日、共御外侮为主题的作品,比如街头剧、小说、电影、话剧等,不断涌现,不论其形式与情节如何不同,沿袭的依然是“抵抗”与“复仇”的叙述框架,承载的是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和结束内战、一致对外的政治诉求,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再没有比共同抵御外侮,更能使处于焦虑不安状态下的人群团结起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国破家亡的创伤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或明或暗渗透到此后政治文化的话语系统中,“雪耻型民族主义”(刘擎语)也成为代表民意的一种主要的民族主义思潮延续到当下,不断地被政治或外交事件激发。在文艺创作方面,看得见的就是抗日题材的作品一直经久不衰,从当年的红色经典到本世纪初期的基于经典改编的抗日影视剧,再到当下为人所诟病的“抗日神剧”。

“抗日神剧”指代的是一类带有娱乐性和神化色彩的、表现抗日战争历史的电视剧,集中出现于 2011 年前后的荧屏并活跃至今,作为一个被归类的定义大约于 2013 年前后出现于互联网并很快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关注和学界的批评,成为一个文化事件。“神”这个词在网络语境中具有“奇葩”、“惊人”的意思,将影视作品称为“神剧”,说明这一类电视剧在细节上的失实到了惊人的地步。此外,某些抗日剧中的价值观也存在庸俗化的倾向,与传统抗战正剧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引发了主流媒体、学者和抗日战争当事人、亲历者的不满。对“抗日神剧”的理论批评文章集中在

2014—2016 年出现,一致声讨其“歪曲抗战历史”、“罔顾公共理性”。

抗日剧活跃的生命力和屡禁不绝的“神化”倾向从表面上看是审查容易通过以及制作方对市场利益的追逐等因素共同造就的。从深层看,则须结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情绪及当代政治文化语境等因素来加以审视。

(一)与传统英雄叙事的互文

根据互文性的理论,一切文本都是对已有文本的重新建构。一部电视剧作为一种文艺文本,其生成过程也会借鉴和参考之前或同时代其他文本,带有以往和现今文艺记忆的烙印,“它摸索并表达这些记忆,通过一系列的复述、追忆和重写将它们记载在文本中,这种工作造就了互文”(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

当下具有神化色彩的抗日题材电视剧与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有着明显的互文关系,后者英雄叙事的神化和浪漫主义风格被前者解码、承续和戏仿。作为一种历史文学样式,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在大多要不违史实的基础上,采用了一些浪漫夸张的手法来塑造英雄、渲染战争场面,甚至借鉴了一些神怪小说的手法,神化战争中的人物和战争兵法,这种倾向一方面是受我们传统文学叙述中神话与史实杂糅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加作品的趣味性。作为经典的《三国演义》自不必说,其他几部涉及民族国家主题的历史演义小说如《杨家将演义》《说岳全传》《说唐后传》等普遍存在这个倾向。这些历史小说,其神化色彩可以从英雄功夫、英雄武器、英雄命运等三个方面来解读,其叙述风格对后来的红色经典小说和“抗日神剧”都有影响。

先谈英雄功夫。比如明代熊大木编撰的《杨家将演义》,反映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战争兵法等都与真实的历史有较大的差距。为了强化忠君

爱国的主题,小说通过大小战争反映杨家父子的神勇。他们力大无穷,箭法高超,比如六郎与番将比射,敌人拼尽全力也不能拉开的弓,六郎却能“一连三矢,并透红心”。杨府的巾幗也丝毫不让须眉,她们能将敌方大将一刀砍于马下,怀孕了还能在阵上厮杀。在“说岳”演义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编次、增订的长篇英雄传奇小说《说岳全传》一开始就将岳飞的出身神化为佛祖护法大鹏,在各种对金战争中岳飞也是经常以少胜多,单枪破阵;其子岳云更是少年神勇,13 岁就能舞 82 斤重银锤掀翻金兵元帅,锤碎金将天灵盖。与这样的细节相对话的则是当代红色经典小说和抗日剧中随处可见的神射手(包括枪、炮和箭)、女英雄、孤胆英雄、少年英雄的形象。

次谈英雄武器。功夫高强的英雄通常离不开一件护身杀敌的冷兵器时代神器,比如《杨家将演义》中的六郎的神箭,焦赞的万夫莫近的飞锤,穆桂英的来自神授、百发百中的三口飞刀;《说唐后传》中的冷兵器更是让我们眼花缭乱,斧、枪、戟……英雄配上这样的武器方能发挥功夫,神勇杀敌。夸张的冷兵器杀敌场面是传统讲史小说常见的情节,在民间传播过程中也是最吸引受众的地方,对历代通俗文学影响深远,建国后随着广播和收音机的普及,说书艺术进一步发展,内容主要是古代历史演义小说,这样紧张的斗兵器场面,说书人讲得兴奋,听书人听得出神,当时的红色经典小说如《平原枪声》《大刀记》都受此影响,有类似的情节,并被改编成评书的段子。当下为受众所诟病的抗日剧的武器也多是此类传统的冷兵器,比如大刀、打狗棍、弹弓等。《一个鬼子都不留》中,杀猪刀、石块、弹弓、飞针全部用上,被网友戏谑为“万物皆武器”。大刀是最常见的杀敌武器,除了《大刀记》,《无敌飞刀》中于震扮演的男一号面对十几个带着

枪的敌人,从枪林弹雨里毫发无损地穿过,一次掷一把飞刀,硬是把成片的敌人撂倒了。《英雄戟》第一集的开始,几个江湖好汉人手一柄短刀,腾空而起,迅疾敏捷,把一车荷枪实弹的鬼子打得落花流水,颇似上述历史演义中的战斗场面。

再谈英雄命运。历史演义小说中的主要英雄在面临险境时经常能够化险为夷、大难不死,最后也总能获得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比如《说唐后传》中的薛仁贵,多次转危为安,他骑马从数十丈山上跳下,竟毫发无伤;他为救主需要过海到中原去,作好在海中会淹死的心理准备,却不料宝驹“赛风驹”可以马蹄着水奔跑起来,连日连夜在海上飞风而去,平安着陆。最后人物的结局是四海升平,满门荣贵团圆。《说岳全传》虽然无法改变岳飞枉死的史实,但仍然设置了一个宋军大胜,岳雷奏凯回朝,之后“子孙繁盛,世代簪缨不绝”的大团圆结局。《杨家将演义》最后的结局也是宗保平定西夏,十二妇得胜回朝,“自是四方宁靖”。红色经典中的主要抗日英雄通常都能历经艰险坚持到最后胜利,抗日剧则设置了更紧张离奇的险境,进一步加强了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而主人公总能从绝境中脱险或反败为胜,致敌死地。最后的胜利也总是属于代表我们民族精神的主人公的。经受考验、完成任务、凯旋归来的英雄形象不仅是与历史演义小说的互文,还是原始神话英雄原型的现代演绎。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英雄叙事中还掺杂了大量的道教神仙法术,点豆成兵、腾云驾雾、神仙救驾等情节经常出现在战争中。所以这是一种介于历史叙事与神话叙事间的比较奇幻的文体,作者创作动机的某些因素及社会影响也与当下抗日神剧有几分相似:“演义作家为了满足读者大众的审美、娱乐需求,为演义争得更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确采用了不少写作方法来涵

容市井庶民的美学情趣,以增强作品的趣味性、娱乐性和可读性。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直接演绎正史所带来的虚幻程度不足、市井生活气息淡薄等缺陷,使作品具有一些鲜活、盎然的生机和灵趣。但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作者有时过于媚从读者,而不注意描写的分寸,也使作品的某些地方显得鄙谬不经或肤浅庸俗,影响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感和艺术品味”(纪德君《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这段评论中所提到的负面影响也正是当下社会对抗日神剧的批评。

历史演义小说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影响了其他样式的文艺作品,而且因为其传播深远,对于塑造民族审美趣味、审美心理都起到了一定作用。直到今天,这些半实半虚的历史演义小说还在被作为经典印刷出版,并被改编成各种影视作品,很少听到批评的声音。而抗日剧因为神化倾向却引起了众怒,个中原因或许正如某个央视访谈节目中所说的,宫廷剧可以戏说,民族惨痛的历史不容戏说。抗日的历史作为一个离现在不远的过去式,是我们民族近现代的切肤之痛,所以,如果出现演义体的美学风格,是不能被还幸存的历史当事人和严肃的批评家所接受的。

(二)对大众民族情绪的迎合

抗日剧的神化倾向虽然受到主流媒体和批评家的批评,却不断被受众热捧,此类剧居高不下的收视率即能说明这一点。大众对此类剧的喜好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长期形成的民族审美情趣外,还与当下国际冲突语境下民间高涨的民族情绪有关。近代中国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引发了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在知识分子层面,表现为系统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建树,主要包括“民族自强”“文化保守”和“维